



军事政治学的逻辑起点、学科定位及价值分析

● 王 杰

摘 要:军事政治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应以军事与政治的关系为逻辑起点,立足于军事学和政治学两大领域,着力揭示军事与政治之间的矛盾运动及其协调发展的规律,以帮助人们正确认识和处理军事与政治的关系。本文在阐释上述问题的基础上,从逻辑起点、学科定位及价值功能三个方面,阐述了军事政治学存在的根据和价值。

关键词:军事政治学;逻辑起点;学科定位;价值

中图分类号:E297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451(2010)03-0136-08

作 者:王 杰,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副教授,博士

军事与政治可以说是人类社会历史上一对不可分离的连体婴儿,自进入文明社会以来,“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1]1915}。所以古今中外一些著名军事家、政治家、思想家对军事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大都有所涉及,比如:孙子的“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2]2},吴起的“内修文德,外治武备”^{[2]424},尉繚的“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能审此二者,知胜败矣”^{[2]227},克劳塞维茨的“战争是政治的继续”^{[3]43},列宁的“‘战争是’这个或那个阶级的‘政治的继续’”^{[4]408}等等,都对军事与政治的关系进行了深刻地揭示。然而,对军事与政治关系进行深入而系统的研究,并向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发展却显得相对迟缓。随着时代和世界形势的变化,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两极世界格局的解体和军事技术上的革命,新世纪军事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及其走向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一大热点。以此为背景崛起的军事政治学,备受学界的关注。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军事政治学的逻辑起点、学科定位及其功能等问题,不仅关系到这一学科存在的价值和根据,而且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军事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军事政治学的逻辑起点——军事与政治的关系

“学科的科学理论体系,一般认为首先应当确定它的逻辑起点,从逻辑起点出发,借助逻辑手段,按照学科的内在规律,层层推导,逐步展开,构成严谨的逻辑系统”^[5]。可见,逻辑起点作为一门学科的“细胞状态”、“始自对象”或“原始的基本关系”,既是整个学科体系形成和发展的关键,又是准确反映该学科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核心要素。因此,准确地把握一门学科的逻辑起点是我们掌握其理论精髓,拓展其理论体系并用于指导科学实践的重要前提。军事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理论,从其理论体系上看,必须有一个符合客观实际



的逻辑起点。但科学的逻辑起点应该是哪个范畴,不能靠主观而定,而要看它是否在客观上符合科学的逻辑起点的基本要求。一般说来,作为逻辑起点应满足以下四个要求:一是——一门科学或学科中最常见、最简单、最抽象的范畴;二是应与学科的研究对象相互规定,直接标志着学科独立存在的辩证范围;三是内涵贯穿发展全过程的核心矛盾,是一切矛盾的“胚芽”;四是同时也是历史的起点。据此,笔者认为,军事与政治的关系应是军事政治学的逻辑起点。这是因为:

首先,军事与政治这对关系范畴是军事政治学中最常见、最简单、最抽象的范畴。按照马克思的方法论,一个科学理论体系的形成,要借助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而这个思维行程所由之开始的地方(逻辑的起点),必须是最抽象的规定。它“不以任何东西为前提”、“不以任何东西为中介”^{[6]85}。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里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碰到过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6]307}一样,军事政治学要首先破解军事与政治这对关系范畴。这是因为:一方面,军事政治学是研究军事与政治矛盾运动及其运行规律的科学,这一研究领域中的诸因素,无不是围绕军事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而展开的,军事与政治这对关系范畴在军事政治学研究领域中,可谓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因而是其最常见的范畴;另一方面,军事与政治这对范畴就军事政治学而言,一看便知,本身不需说明,只是用来说明其它事物,就像数学公理一样不证自明,一旦要对它进行说明,就会引入比它复杂的范畴。如在《资本论》中,商品是最简单的范畴,要对商品进行说明就要引入劳动,在军事政治学中,要对“军事与政治的关系”进行说明与阐释,引入的范畴无一不比“这一原始关系”更为复杂。因此,在军事政治学领域中,军事与政治这对关系范畴不以任何东西为前提、不以任何事物为中介,是军事政治学中最基本、最简单、最普遍、最抽象的范畴。

其次,军事与政治这对关系范畴高度概括了军事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准确反映了军事政治学研究的实质。逻辑起点应该是学科中所要研究对象总和的一种本质的、抽象的规定。也就是说,必须保持逻辑和逻辑所反映对象的一致性,一旦超越了它,哪怕是向更简单的方面迈出一小步,这种一致性就立刻遭到破坏。众所周知,“物品”比“商品”、“存在”比“物质”更抽象、更直接,问题就在于,一旦以“物品”、“存在”作为理论的逻辑起点,由此建立起来的体系就不再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体系了。这种不同的体系同时意味着它们的研究对象也发生了变化。因此,作为逻辑起点的军事与政治这对范畴的抽象程度,不能离开军事政治学的研究对象,说它是军事政治学中最简单、最原始的规定,只是讲在军事政治学的研究领域里面它必须抽象到不能再抽象的程度。军事与政治这对关系范畴作为军事政治学本身独有的或加以特殊规定的基本范畴,与其研究对象在性质上应是相同或相近的。军事政治学是研究军事与政治特殊矛盾关系及其运行规律的,而要揭示这个规律又决定了人们首先要探讨军事与政治这对范畴的关系。即是说,军事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决定了其逻辑起点的范围和界限。同时,军事与政治这对关系范畴也规定了军事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对军事与政治协调发展规律的研究和把握,是以军事与政治的辩证关系把握为基础和前提的。军事政治学正是从军事与政治这对基本范畴出发,一步步、一层层地推演和展示出其中蕴含的具体内容,进而使军事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及其属性逐步、逐层、逐级的表露出来。因此,军事政治学的研究对象虽然决定着逻



辑起点选择范围和确定界限,但它自身能否明白展现,能否确定无疑地得以成立,又有赖于逻辑起点的准确规定。换言之,军事与政治这对关系范畴作为军事政治学的逻辑起点又规定着其研究对象。

第三,军事与政治固有的内在矛盾,蕴藏着军事政治学形成发展过程中一切矛盾的萌芽。列宁说:“必须从最简单的基本的东西(存在、无、变易)(不要其他东西)出发,引出范畴在这里,在这些基本的东西里,‘全部发展就在这个萌芽中’。”^{[6]55}军事与政治的辩证关系内含贯穿军事政治学发展全过程的核心矛盾,包括整个体系对象在发展过程中的一切矛盾和可能。军事是指以准备和实施战争为中心的社会活动。它包括战争的产生、发展和消亡,战争的进程和结局,作战方法的研究和应用,武装力量的组织、训练和作战行动,武器装备的研制、生产和使用等等。而政治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为实现统治者利益需要而建立的统治与管理体系,是人们以政治权力为核心展开的各种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的总和。军事与政治的区别是显而易见,但二者又是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首先,政治决定军事。主要表现为:政治是整体,军事是部分,“战争不过是政治交往的一部分,而决不是什么独立的东西”^{[3]894},政治产生战争;政治是目的,军事是手段,“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政治目的的性质、我方或敌方的要求的大小和我方的整个政治状况事实上对战争起着最有决定性的影响”^{[3]890};政治贯穿于军事的全过程,“政治贯穿在整个战争行为中,在战争中起作用的各种力量所允许的范围内对战争不断发生影响”^{[3]43}。其次,军事对政治具有反作用。战争的结局影响政治的发展。一般地说,战争的胜利者,可以实现其政治目的,使政治继续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面发展;失败者,则朝着不利于己的方面发展,甚至被迫改变自己的政治和政策。第三,政治与军事的有机统一,体现在战争中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的完美结合。正如英国军事理论家利德尔·哈特所指出:“在讨论战争的目的时,必须明确地把政治目的和军事目标之间的差别弄清楚。这两种目的是有区别的,但是又紧紧地彼此联系着,因为一个国家决不会是为了战争而发动战争,必然是为了追求某种政治目的而进行战争。”^{[7]461}“可是,负责解决战争问题的人,基本上都是职业军人,因而很自然地出现了一种倾向,即往往忘记了国家的基本目的,而只注意到军事目标。结果,在每一次战争爆发以后,政治目的反而会常常受到军事目标的制约。……由于不理解政治目的与军事目标之间的正确关系,不理解政治和战略之间的正确关系,军事目标往往被曲解了,变得过于简单化了。”^{[7]462}所以历史告诉我们,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它本身并不等于达到了政治上的目的。由此可见,军事与政治的辩证关系,构成了军事与政治辩证法的全部内容,孕育着整个军事政治学的胚胎与生长点。

第四,军事与政治也是军事政治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的起点。“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8]43}就是说,逻辑上最初的东西应当表明它在历史上也是最初的,科学理论在历史上的起源应当“凝结”为作为理论内容叙述起点的逻辑范畴,逻辑和历史的统一,理论地再现历史,这是建造科学理论结构体系的根本原则,同样也是确定军事政治学逻辑起点时所应遵循的



根本原则。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军事与政治始终有着紧密联系。政治斗争主导着军事斗争,军事斗争又反作用于政治斗争。因此,“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把战争看作是独立的东西,而应该把它看作是政治的工具,只有从这种观点出发,才有可能不致和全部战史发生矛盾,才有可能对它有深刻的理解。”^{[3]43} 自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然而战争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治,而是流血的政治。历史上的每次战争,都是具有政治性质的行动,并在一般政治手段解决不了矛盾的情况下产生的,所以,国家与国家、阶级与阶级、民族与民族、集团与集团之间因为政治、经济等原因发生矛盾后,首先都采用非暴力的政治、外交手段试图解决,当不能达到目的时,就用战争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战争就成了解决矛盾的一种最高斗争形式。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们对军事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认识也在不断深化,中国古代的军事思想家们已开始把政治作为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或首要因素来看待,如“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2]18},“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之谓正。正不获意则权。权出于战,不出于中人”^{[2]80}等等;以克劳塞维茨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军事思想家们首次提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论断,并通过这个论断基本正确地揭示了战争的政治本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批判地汲取了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论断的合理成分,改造了这个论断中的政治概念,恩格斯在分析16世纪以宗教口号掀起的大规模的德国农民战争时,就曾明确指出,这些战争都是“阶级斗争的搏战,每一次都把斗争内容简明地以政治标语的形式写在旗帜上”^{[9]85};列宁进一步指出:“‘战争是’这个或那个阶级的‘政治的继续’”^{[4]408},而且“战争中的政治也是由统治阶级决定的。战争完完全全是政治,是这些阶级通过另一种途径继续实现同样的目的”^{[4]361};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把战争与政治的内在联系更加具体化,他指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在这点上说,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10]479},但“战争有其特殊性。在这点上说,战争不即等于一般的政治。‘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障碍既除,政治的目的达到,战争结束。障碍没有扫除得干净,战争仍须继续进行,以求贯彻”^{[10]479}。这些论断丰富和发展了对政治与军事关系的认识,使之成为我们考察军事与政治问题的理论基础。

二、军事政治学的学科定位——军事学与政治学的交叉学科

普鲁士军事改革家、克劳塞维茨的“精神之父”格哈德·冯·沙恩霍斯特曾指出,所有时代的经验都证明,一切不将政治观点与军事上的可能性紧密结合起来,不将政治与战争艺术紧密结合起来的计划,都很少能产生大的效果。军事与政治的这种密切关系,迫切需要军事学与政治学进行联姻,进行相互交叉和渗透,以有效指导军事斗争实践中的政治问题或政治斗争实践中的军事问题。因为,“在学科的边缘和内部地带存在着单一学科不能解决的复杂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和研究需要借助相邻的学科”^[11]。所以,正如俄国军事家德·阿·米柳京所指出:“军事学术理论的最高层部分与政治科学研究的对象是密切联系的,甚至是融为一体的。”^{[12]108} 同样,也可以说“政治学术理论的最高层部分与军事科学研究的对象是密切联系的,甚至是融为一体的”。



军事政治学的学科性质 军事政治学作为一门交叉性学科或边缘性学科,横跨政治学和军事学两大领域,在学科上具有政治学与军事学之双重属性。一方面,它既“姓军”又“姓政”。说它“姓军”,是因为它是军事领域的问题,但又不是纯粹的一般意义上的军事问题,而是军事领域中那些具有政治性质、政治意义的军事问题;同样,说它“姓政”,是因为它是政治领域的问题,但又不是纯粹的一般意义上的政治问题,而是政治领域中那些具有军事性质、军事意义的政治问题。这样,作为交叉学科的军事政治学在研究对象上既与军事学的研究对象存在着某种“重叠”,又与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存在着某种“重叠”。军事政治学的双重学科属性表明,军事政治学不仅有资格成为军事科学体系中的一个门类,也有资格成为政治学体系中的一个门类。另一方面,军事政治学既不“姓军”也不“姓政”。因为“只有跨出学科的边界,才能实现学科的交叉与融合”^[11]。军事政治学既不等于纯粹的军事学,也不等于纯粹的政治学。虽然军事学与政治学两“界”中存在着天然内在的逻辑关系,但无论拘泥于“姓军”还是“姓政”哪一层面,都难以完整地把握军事政治学的学科定位。也就是说,军事政治学的研究,既不能局限于单纯的军事视野,也不能囿于纯粹的政治学的范畴和原理,而应打破两“界”的界限,着力揭示军事与政治之间矛盾运行的规律,积极探索二者协调发展的路径,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军事学与政治学的交叉和融合。

军事政治学的内容体系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把军事与政治特殊矛盾关系及其运行规律视为军事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众所周知,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没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不能有正确的军事方针,一切战争都具备着政治的要素,没有政治要素的战争是没有的。军事与政治的密切关系及其矛盾运动,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特殊现象,我们应当在回眸历史的基础上,立足当代,面向未来,深刻揭示军事与政治矛盾运行的特殊规律,来构建自己的理论形态,使其成为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基于此,笔者认为,军事政治学理论体系应当着力研究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在宏观层面上,注重研究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要在揭示军事与政治辩证关系的基础上,着力探讨战争与政治、军事力量与政治(军队与阶级、军队与国家、军队与政党)之间的关系。军事是以研究战争为核心的,探讨战争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是研究军事与政治关系的题中应有之义。至于军事力量即军队与政治的关系则更为直接,因为军队被称为国家政权的主要成份。而在阶级社会里,“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13]336}这种军队、政治与阶级斗争的关系决定了政治是军队的基本属性,军队和政治不可分。任何一支军队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为了某个阶级的需要而产生、而存在的。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国家的军队无不如此。而无产阶级革命军队与政治的关系更是十分明确,因为“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8]443},“革命军队所以必要,是因为只有强力才能解决伟大的历史问题”^{[14]528},这里的“伟大的历史问题”当然包括政治问题。二是在中观层面上,注重研究军队内部军事生活与政治生活之间的关系。军队是从属于政治并为政治服务的,这就要求军队既要服从于某一阶级或政党的绝对领导,又要有强大的战斗力。因此,正确认识和处理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之间的关系、军队内部民主化与军队管理特殊性要求之间的关系、军队内部科层制的权力结构对军事工作的影响等,则至关重要。三是在微观层面上,注重研究军人的军事素质与政治素质之间的关系。军人是构成军队的细胞,是建构军事力量



的基质,其军事、政治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一国军事力量强弱、政治走向以及军队在国家政权中扮演的角色。四是在实践层面上,注重研究军事与政治协调发展的路径。如:一个国家如何使军事战略与政治实力相匹配,如何在坚持军事民主、政治民主中使军队从属于政治并服务于政治,如何在坚持军政一致、军民一致中使军队与地方相互支持、和谐发展,以及新世纪新阶段军事与政治呈现出的复杂局面如何有效应对等等。

军事政治学的研究路径 军事政治学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其成长发展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当前应着力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强化军事学与政治学两门“母学科”的研究与交流。军事政治学是从军事与政治辩证关系的角度研究两者运行规律的,有其独特研究领域、基本范畴和理论体系,但作为军事学与政治学的交叉学科,它又以这两门“母学科”的基础知识、基本原理为依托。该学科的这一特点,决定了我们对军事政治学的研究必须建立在对军事学和政治学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只有真正达到两门“母学科”知识的融会贯通,才能使军事政治学的建构真正摆脱军事学与政治学的板块结合,或者某一母学科之下“流浪儿”的局面。同时,“政治学不能,或许也不应当能够断言它有研究政治的独断权利;其他学科时常进入并深入渗透它的领域。但……政治学家在探求更多的知识和更好的手段时也时常和多次进入其他领域。”^[15]换句话说,就是其他学科常常渗透着政治问题的研究,政治学科也时常入侵其他学科的领地,所以政治学中有关军事问题的研究、军事学中有关政治问题的阐述,也给我们构建军事政治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二是强化军事政治学思想自身发展的研究。通过整理中外历代著名军事家、政治家、思想家的军事政治学思想,以丰富军事政治学内容,是促进该学科快速发展的一种有效方法。军事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还比较年轻、甚至还没有建立起来,但作为一种社会思想却源远流长。在中国古代的《孙子兵法》、《孙臆兵法》等兵书中,在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富勒的《战争指导》等国外军事理论家的著作中,都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军事政治学思想,我们应取其精华,除其糟粕。另外,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长期革命实践中,也积累了非常丰富的军事政治学思想,如对战争政治本质的认识,对人民军队的社会地位、社会职能的理论等。对于这些丰富多彩的军事政治学思想,我们应该加紧整理、学习和研究,使之理论化和系统化。三是强化战争个案研究。战争的爆发、进行与结束,是军事与政治进行互动的典型体现,比如中国的抗日战争,毛泽东认为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犬牙交错的战争,是半殖民地大国举行的解放战争的特殊形态,日本史学家石岛纪之也认为,中国抗日战争是一场“政治与军事搅在一起的战争”^[16]。再如,抗美援朝历史进程及军事决策过程也是军事与政治相互作用的生动体现。可见,通过对一些重大战争个案中军事与政治的互动研究,我们可以从中总结军事与政治的矛盾运行规律,以此促进军事政治学的科学建构。四是要善于借鉴、吸收国外当今的相关研究成果。当今的一些西方学者对军事与国际政治的关系;军队与社会整合所需的政治条件及其对军队军事功能的影响;军事系统内部的政治关系与政治现象(如政治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行为等);军事专业化的政治原因、政治影响及其在政治系统变迁中的地位;作为政治制度的军队、军事机构对决策过程的影响;军事组织科层制的政治学分析等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相当多的成果,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吸取的地方。因此,我们要善于借鉴、吸收其有益成果,来推动军事政治学的构建。



三、军事政治学的价值——理论创新与指导实践双重功能

交叉学科研究是当今社会科学发展的显著特征。“交叉学科研究有利于学术思想的交融,有利于综合性地解决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11]军事政治学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具有军事政治理论创新和指导军事政治实践的双重功能。

军事政治学有助于军事学、政治学的创新发展 学科交叉是理论创新之源。“几乎没有人否认相当多的跨越边界有助于知识的进步,无论它可能伴随着多么严重的‘边界问题’。”^[13]军事政治学的创立,首先,为军事学研究提供了新观念、开辟了新领域。它把军事放置在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社会政治背景中,研究军事行动和政治斗争之间的共变关系,可为军事行动找到政治依据,为战争规律找到政治理论的参照系统,因此说它突破了军事学研究的局限性,把军事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领域。其次,军事政治学也为政治学研究开辟了新领域。政治学是研究以国家为核心的各种政治现象、政治制度、政治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其中政治关系包括阶级关系、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国家之间的关系等。但军事与政治的关系更为密切,如军队与阶级、政党之间的关系、军事力量的强弱对国家间关系的影响、国家与战争之间的关系等等,政治学加强对这些关系的研究不仅开拓了政治学研究的新领域,而且丰富了其研究的内涵,对政治学研究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再次,军事政治学的建构本身就是一种创新。军事政治学在其建构过程中,以崭新的逻辑起点,开辟独特的研究领域,融合军事学与政治学的某些观点,进而创立了更广泛的知识结构体系。

军事政治学能够帮助我们全面认识军事与政治关系 众所周知,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是军队建设的两个重要方面,它们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辩证统一关系,这是由军事和政治的本质联系决定的。长期以来,我们对社会系统内部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相互关系的认识,往往是停留在经验性的总结上,缺少从科学的高度加以概括和提炼,致使我们走了不少弯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就军事系统和政治系统的关系而言,比革命战争年代和解放初期要复杂得多,比如随着大规模战争的结束和国内敌对阶级的消除,一些人对政党、阶级与军队之间的关系存在模糊认识,甚至对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产生怀疑;通过血的教训,对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认识比较深刻,而对军队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巩固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职能认识不清;军地之间、军民之间的凝聚力明显减弱,军地之间不同的物质利益范畴的存在和发展,使原来的军民关系的内涵发生了一定变化。就军队内部的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而言,也存在着一些不和谐因素。因此,我们不能把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对立起来,这在我军历史上有着过度拔高和忽视政治工作带来的沉痛教训,但在现实的工作中仍有少数人对二者关系不能辩证把握。军事政治学以军事与政治的相互关系为逻辑起点、以解释军事与政治的矛盾运动规律为己任、以探寻军事与政治的协调发展为归宿,从理论到实践对二者的关系作系统研究,毫无疑问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正确处理军事与政治的关系。

军事政治学能够提高军队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的有效性 军事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能够帮助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军事与政治二者间的关系,以提高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的有效性;同时,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它兼容军事学与政治学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



法,这也有助于提高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的有效性。限于篇幅,仅就政治工作举例一二。政治社会化理论是政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意指政治文化的传递和传播,而政治文化是政治体系的心理层面,它包括“一国居民中当时盛行的态度、信仰、价值观和技能”^{[17]153}。一方面,对于个人而言,政治社会化是习得政治文化的过程和结果;另一方面,对于团体(小到家庭大到国家)而言,政治社会化是将其自身政治利益相符的文化赋予成员的过程。而军队政治工作是党在军队中教育群众、组织群众,使其为实现党的纲领路线而奋斗的社会实践活动。就思想教育内容而言,主要包括组织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进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进行历史使命、理想信念、战斗精神和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进行人民军队性质、宗旨、职能和优良传统教育,引导官兵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始终保持政治上的坚定性和思想道德上的纯洁性,始终保持坚强革命意志和旺盛战斗精神,做到: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由此观之,我们可以说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质就是政治社会化。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可以从政治社会化的媒介、影响因素、类型、作用等相关内容中获取许多有益的启示。此外,政治学关于政党的一般理论、关于政治暴力的探讨、关于中国政治独特发展历程的理论升华等,都可以服务于军队政治工作关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研究,使其更具说服力。

参考文献:

- [1]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82.
- [2] 五经七书注释[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
- [3] 克劳塞维茨. 战争论:第1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 [4] 列宁军事文集[M]. 北京:战士出版社,1981.
- [5] 翟葆奎,喻立森. 教育学逻辑起点的历史考察[J]. 教育研究,1986(11).
- [6] 列宁全集:第5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 [7] 利德尔·哈特. 战略论[M]. 北京:战士出版社,1981.
-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9] 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1卷[M]. 北京:战士出版社,1981.
- [10] 毛泽东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1] 刘大椿. 学科整合与交叉学科时代的到来[J]. 中国外语,2008(5).
- [12] (苏)米尔施泰因等. 论资产阶级军事科学[M]. 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5.
- [13] 列宁全集:第3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 [14] 列宁全集:第8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 [15] 高民政. 政治艺术论纲[J]. 政治学研究,2000(1).
- [16] (日)石岛纪之.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的中国战线[A]. 转引自潘丽萍. 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宣传思想工作[J].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0(8).
- [17] (美)阿尔蒙德. 比较政治学[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

(责任编辑 魏延秋)